

渊源中探本真 传播中见变化

——李利安教授著《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一书评介

王宏涛

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以下简称《渊源》)一书于2008年6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国际学术界在佛学研究尤其是佛教信仰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渊源》一书凝聚了作者十几年苦心钻研的成果,呈现出众多创新性特点。我认为以下这几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研究思路新颖别致,全书结构完整紧凑,内在逻辑严谨贯通。黄心川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观音信仰研究纳入了一个信仰体系之中”。作者在探讨观音信仰的渊源时,勾勒出观音信仰在印度最早从海上救难这种现世救度信仰发展到来世的净土接引信仰,再到智慧解脱型信仰和密教观音信仰。作者在探讨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时,从观音信仰的“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展开考察,将印度的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过程分为“最初输入”与“其在中国引起的共鸣”、“全面输入”与“中国人的选择接受”、“输入完成”与“中国人的进一步接受”三个阶段。从主客两个方面考察,更加清晰而真实地揭示了观音信仰从域外向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而主客体结合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播历程又经受了实践性的经验。作者在阐述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各主要阶段的论述中,均辟出专节对古代观音信仰被中国人接受后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进行专门的考察,以中国的各种僧传、笔记小说、佛教造像为具体事例来说明观音信仰的实践推广。实践环节的增加使对观音信仰入华历程的考察从“客体——主体”的框架发展到“客体——主体——实践”的结构,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大为增加,思想内涵也更加丰富。最后,作者又将传入中国并在实践中逐渐凝结而成的观音文化划分为“观音宗教文化”与“观音世俗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和修持仪轨,包括对观音神力的崇拜和为获得这种神力而进行的宗教修持活动,后者是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哲学、伦理、文学、艺术、民俗、养生等方面。这就使得本书的逻辑结构进一步发展为“客体——主体——运用——文化”四个层面,不但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视角更高。

第二,《渊源》一书在菩萨研究方面呈现出许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按照不同时期对观音名称的不同翻译方法将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初译”(光世音,以竺法护为代表)、“旧译”(观世音,以鸠摩罗什为代表)、“新译”(观自在,以玄奘为代表)三个阶段,这种按名称、分阶段、分别阐述的方法可为类似的其他研究提供借鉴。再如,作者按照观音类经典的不同将观音信仰的经典依据划分为“净土往生系统”、“受记系统”、“华严系统”、“般若系统”、“救难系统”、“菩萨行系统”、“密教系统”等七大系统,并根据佛经原典赋予观音的各种不同的功能创造性地将观音信仰划分为“称名救难型”、“净土往生型”、“智慧解脱型”、“密仪持咒型”、“行善福报型”、“解疑释惑型”等六种主要类型。再如,作者将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分为了“观音身世”、“观音显化”、“观音灵感”、“观音道场”四个方面,分别涵盖了观音的神秘身份、观音的神奇法力、观音的信仰效应、观音的空间场所等不可或缺的信仰内容。而在考察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教的关系时,又分别强调了道教影响下的观音神格化、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观音伦理化两个不同的趋向。这些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可以为我们的类似研究时提供借鉴。

第三,注重对观音在印度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加强了我国大陆学术界佛教研究的薄弱环节。《渊源》一书用了约十五万字的篇幅对印度的观音信仰进行了纵向的系统考察。作者首先对观音信仰在印度的起源进行了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考证,认为“自古相传的在印度大陆南端解救‘黑风海难’和‘罗刹鬼难’的信仰,成为观音信仰的主要来源。”而观音的原型就是那匹“救海难的宝马”。接着作者又对这种救难型观音信仰如何向净土接引信仰和智慧解脱信仰扩张进行了探讨,然后继续顺着历史演进的次序,对印度观音信仰的密教化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印度观音信仰从救难型向净土接引型、智慧解脱型以及密教化方向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同时作者还对流传在印度民间的观音信仰进行了研究,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生动图

画。这方面的研究正是中国学术界多年来从未有人系统涉及的领域，对我们理解中国观音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决的很多问题，精彩论述很多，创见迭出。《渊源》一书对观音信仰的起源与演变以及向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涉及很多具体的内容，在很多方面解决了目前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譬如观音到底如何起源？最早的观音信仰形态是什么？观音信仰的不同内涵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观音信仰何时以及怎样传入中国？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中国化到底是如何体现的？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结构与基本特点是什么？类似的这些创新性观点很多，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总结出 15 个方面，我认为这 15 个方面仅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创新而已。另外，很多具体的问题在本书中也得以探讨，并获得全新的解释。如“观世音”这个名字是不是在唐代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去掉了其中的“世”字，作者在做出了缜密的考察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作者还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的学者混淆了《普门经》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区别；有的学者误置法云与吉藏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将支曜所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误作支谦所译，并将观音在此经中的译名误作“窥音”，而将支谦所译《维摩诘经》中所用“窥音”一词误作“观音”。类似的纠错在书中有很多处体现。

第五，揭示了中印文明交往的基本特征，对当今文明交往具有现实借鉴价值。由于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文化的输入与中国化的过程，体现出和平、互补、广泛、深刻等许多文明交往的特征，所以，研究观音信仰的渊源及其向中国的传播，就是在揭示一种外来文化入华历程、在华命运走向及其所包含的内在机制与丰富的个性特征，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一种跨时代、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传播，探索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交往形态以及这种交往形态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作者以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为考察对象，对佛教文化的跨国传播做出很多哲学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印两国之间的整个文明交往。所以本书不只是简单地考察历史，勾画线索，把握脉络，而是在研究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同时，思索和分析文明交往这个既具有丰富内涵，又具有广博外延的理论问题。作者探讨观音文化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为人类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研究提供具体的例证和有益的借鉴。在中西方文明交往空前活跃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今天，应该说，本书所揭示的中印佛教文明交往历程与交往特征的确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作用。

学术无止境，这本著作的出世，并不意味着观音信仰研究的完成；恰恰相反，作者只是为观音信仰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借助这一大门也使我们看到了观音文化中许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挖掘。首先，藏地号称是“观音教化之地”，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藏地的观音信仰未能体现在本书中；其次，日本学者在观音信仰方面有很多研究，尽管涉及印度观音渊源以及向中国输入的部分并不是很多，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本书如能全面借鉴和吸收的话，一定会使得观音文化的研究获得进一步的拓展。第三，作者对敦煌文献中有关观音的文献虽有涉及但还非常薄弱，而敦煌文献对于解释印度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这并不是《渊源》一书的研究主线，但却是其自然的延伸；第四，《渊源》一书尚未对印度观音信仰终止向中国输入的宋代以后中国观音信仰的演变进行研究，说明本书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依然存在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无论如何，《渊源》一书都是值得一读的高品位的学术专著，我们对于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尊敬，对于作者的众多创新表示由衷的祝贺，并期待着作者能有更好的作品不断问世。

（王宏涛，西北大学佛教所博士生）

巴哈伊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维建

2010 年 9 月 21 日，巴哈伊教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研讨会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山东大学、宁夏大学、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以及社会各界热衷于巴哈伊教研究的学者共 30 余人参与讨论。

作为一种新兴的世界宗教，巴哈伊教主张“宗教同源，世界一体”，以其调和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现